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經濟改革開放後上海區域的空間結構及使用變遷（ ）

計畫編號：NSC 88-2811-H-002-0003

執行期限：民國87年8月1日至88年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王鴻楷 教授 (hungkaiw@ccms.ntu.edu.tw)

博士後研究員：洪啟東 (jackhung@ms5.hinet.net)

執行機構與單位：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一、摘要：

中文摘要

上海區域的空間發展以及相關的制度，自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起了戲劇性的變化，例如表現在土地制度、土地與財政的審批權和人事權等之配置、市民集體消費設施與土地利用形式等，皆有不同於七零年代末期之前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下的情況。有關上述現象的研究成果包括本案研究者近五年的著作論述(如後續引用文獻)。本計畫的主要工作乃銜接前述研究(NSC87-2415-H-002-043)經驗，企圖釐清“上海區域”的空間波及效應是否含括南京地區？長江中下游城鎮的空間發展機制究竟為何？我們試圖釐清不同於傳統資本主義城市、計畫體制下的中國大陸城市空間發展機制。

本研究透過對南京及其腹地裡的中小城鎮之經驗研究(例如，南京的城市發展、鄉鎮企業、皖南“經濟協作區”，以及峨橋和劉渡這兩個名不見經傳卻奇蹟式的成為全中國最大集散地的小鎮)，說明區域城市上海的空間發展與寧皖地區的發展差異：上海乃得助於中央政府有意的權力下放(垂直式)，而長江中下游城鎮卻得不到中央政府的特別政策眷顧。然而透過自主性之積極(平行式)的“區域經濟協作”，開展九零年代長江中下游城鎮充沛的活力，非但拓展地方的產業經濟版圖，且不經過區域城市上海的中介，而直接接棒國際產業分工的過程(例如，金箔與輪胎等鄉鎮企業)，此等現象似非西方區域發展之主流學理所能解釋，同時也是本研究的重要發現。

本文聚焦在：(1).南京自經濟改革開放後迄今的空間發展及其鄉鎮企業(如，AA金箔集團)對地方的影響。此部分有助於我們檢視滬寧在發展上的差異；(2).南京與安徽的互動關係，特別是基於地方政府間平行策略聯盟的“經濟協作區”(這方有助於我們以更清楚的視角去觀察長江中下游城鎮由下往上的自發性發展。此等經驗與上海或北京等特大城市的發展過程是截然不同的)；(3).安徽境內的峨橋與劉渡二小市鎮的發展(此等市場機制所營造的發展氛圍，甚至勝過中央政府刻意在附近建造，具有區位優勢之市場規範)。前述為本研究案的具體成果，應能代表長江中下游城鎮及其區域空間變遷現象的複雜與多樣性，也應有助於區域及地方發展理論之進一步的演進與完整化。

關鍵詞：南京、安徽、長江流域、地方發展、鄉鎮企業、區域空間發展、中國大陸。

Abstract

Since Teng Xiaoping's 1992 visit to the southern China, dramatic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areas of land ownership systems, land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related decision making power, provision of urban collective facilities, thus transforming what were drastically different before late 1970s when the country was completely under socialistic rule. Research undertakings on these phenomena include references, by investigators of this project, following the text of this report. The effort is to continue the work started in previous NSC research grants on the post-reform development of the Shanghai region, and clarify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nghai and Nanjing areas: is Nanjing area really economically predominated by Shanghai region? What are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owns along the mid- and lower-stret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that determine regional and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in present China, a gigantic and intriguing country retracking from orthodox socialism to a "market economy with socialist characteristics".

By probing into the experiences of recent development in Nanjing and its nearby cities and towns (e.g., Nanjing's urban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the Southern Anhe Economic Cooperation Region, and the success of the two obscure townships—Erqiao and Liudu, which turned themselves into China largest distribution center for tea and timber), we try to illumin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hanghai region and the Nanjing/Anhe region in terms of spatial development. Shanghai benefits from policies of power decentralization adop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treats Shanghai as the spearhead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take-off, while the other, like many other regions, has to grow on their own. Interestingly, through establishing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Region, the energetic growth of cities and towns on the mid- and lower-stretches of the Yangtze can be observed in the 1990s. Not only do they extend their economic power, they bypass Shanghai as the intermediary to connections with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e.g., the tire and golden foil township enterprises). These phenomena can not be explained by conventional capitalism-based theories of local development. They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s of our investigation.

We focus our efforts on: 1.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Nanjing since the reforms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thereon. This helps our observation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anjing and Shanghai regions in terms of post-reform development; 2. The interactions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of Nanjing and municipal/regional jurisdictions of Anhe province when coordinating their attempts to promote local economic growth, especially their efforts in establishing the Southern Anhe Economic Cooperation Region mechanism; and 3. The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mall towns of Erqiao and Liudu in surpassing neighboring, more strategically located, central government-supported cities to become national distribution centers. These results of the project hopefully help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patterns of local development observable in the great valley of Yangtze river, and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of regional and local growth.

Keywords: Anhe, local development, mainland China, Nanjing, reg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Shanghai region, spatial structure, township enterprises, Yangtze river.

二、緣由與目的：

上海市、江蘇省與浙江省所在的江浙沿海地區，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中國大陸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吳浙等，1995: 152-170; 史忠良、李建德，1996: 216-235)，特別是經濟改革開放後之九零年代上海區域的城鎮體系發展，及其空間結構的變遷更是耀眼(崔功豪，1993: 280-307; 王鴻楷，1995-97; 洪啟東，1998; Powell and Leeming, 1990: 160-167; Jacobs and Hong, 1994: 224-252; Putterman, 1995: 1047-1064)。前述研究的主要貢獻在於：區域城市上海的快速變遷與中央政府的權力下放有莫大的關聯；當然此等機制與上海的時空背景，以及土地的有償使用與級差制度有關係，也與地方政府、部門經濟自經濟改革開放後，擁有部分的土地和財政的審批權(也導致所謂“諸侯經濟”的產生)，以及人事的任用權，遂展現了充分的活力(空間之尋租現象)有關。

本研究欲探究的是長江中游之寧皖一帶地區之空間發展機制，是否仍適用於前述的解釋；例如，地方旺盛的發展機制，是否真的要靠中央之權利下放？果若此，則發展的掌控權還是在中央政府，並非是我們所樂於看見的地方自發性發展。另，鄉鎮企業與地發發展的關係，也是本研究所要檢視的。對於上述研究伊始的假設性問題，顯然在長江中游的南京與安徽地區突破了我們過去(王鴻楷，1996-97；洪啟東，1998；王鴻楷、洪啟東，1999: 113-131)的研究侷限(如后)。換言之，本研究延續我們對上海區域空間變遷機制的追蹤，透過對南京地區的城市空間發展過程與內部質的經濟技術開發區，鄉鎮企業、皖南經濟協作區，以及安徽省境內的合肥、蕪湖、馬鞍山市、劉渡鎮和峨橋鎮等區域空間的田野觀察(參圖一，次頁)，指出下列三項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 1.長江中下游城鎮旺盛的市場經濟策略聯盟現象¹，此等地方市場自主性的空間發展機制不同於區域城市上海的空間變遷之源於“簡政放權”的作用，以及結合城市體制於轉軌時之黨政企不分的經濟體(洪啟東，1998: 195-197)；相反地，這是“自下而上、平行結盟”的地方政府與部門經濟之向上要權與市場要錢的資本主義經濟運作(板塊經濟的結盟)。南京“一區多園”式與結合文化生產等類型的經濟技術開發區，更異於上海區域現象，這是兩者最大之差異(洪啟東、王鴻楷，1999: 45-60)；
- 2.南京雖在上海的區域範圍(相距三百多公里)，就市場生產元素與產銷管道也受其空間經濟的波及效應(顧松年等，1985: 23-40; 郁謙，1985: 41-48；仲玉琪，1995: 31-35；洪

¹例如，經濟協作區與地方部門經濟發展的合縱連橫，以及如何帶動地方的空間變遷及其如何形成特定商品經濟聚集市場空間，詳后的皖南經濟協作與劉渡和峨橋的經驗研究。

銀興、曹勇；1996: 153-168)，然皖南地區卻逐漸視南京為長江中下游的“中心²”。趙晨(1996: 14-16)利用重力模式與Converse, P. D.的“斷裂點理論”，間接的支持我們的說法，趙文：(南京與上海)兩城市引力斷裂點理論上在常州附近(鎮江、丹陽一帶)(同上引，頁16)。亦即，南京對於安徽一帶的經濟作用與產業關連，尤勝於其以往的政治中心角色，特別是從經濟協作區的角度去檢視城市的空間位階上，更可看出南京在寧皖一帶的空間效應與層級性，此等發現是後社會主義城市中國大陸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特殊發展現象，目前並未有相當的文獻論述。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3.研究發現皖南地區，非常有趣的出現了一批的集體自發性之專業批發市場，它們皆非交易商品的原產地，卻成為該商品的大宗集散地(例如，安徽省的峨橋鎮與劉渡鎮)，此等現象在空間經濟學上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學理，也與本研究個案中的江寧縣AA鎮金

²南京自古即為(六朝的)政治中心，並不具地方“經濟中心”的城市功能，即便是經濟改革開放後，受限於解放前之國民政府所在地的意識型態影響，也未積極的從事經濟發展(Shen and Yao, 1988: 128-147; 曹幸穗等，1996: 315-317)，一直要到九零年代初期鄧小平南巡之後，才開始在城市功能的佈局上有了變化(崔功豪，1993: 280-307; 李廣錡、周嵐，1995a: 7-11; 1995b: 50-54; 蓋星石，1997: 36-40)。此處“中心”表城市政策與經濟消費上的中心，也包含都市的位階功能。

箔鄉鎮企業集團³的表現不同。後者是先在企業的外圍向鎮上租地，並鼓勵員工入股辦小商品批發市場（並保證三年獲利），爾後待當地的消費空間與環境地景形成後，再開發房地產，這是透過鄉鎮企業集團的力量來型塑(商品)批發市場；然而，我們要交代的是前者所謂的“集體自發性的批發市場”係指：安徽省的峨橋鎮與劉渡鎮，它們並不生產集散商品(茶葉和木材，即便是方圓數里也無)，而且聯外並無一、二級公路，可是卻都成為全中國大陸主要的批發交易市集，也擊退中央政府下鄉興辦同性質的產業市場。初步分析雖然與當地政府能提供近似無償，且便宜的土地作為交易商的倉儲(以劉渡的木材交易市場為最)與休憩有關，且或許也與地緣與區位便利(近長江口與鄰近有車站)、或販售的歷史與習慣有所關連。但是，我們認為這是中國大陸自經濟改革開放後，草根經濟自主性形成的重大突破，它在城鎮空間結構及其發展的意義表明：(1). 鄉鎮企業集團與(小)城鎮經濟發展的依存關係與重要性(如AA鎮的金箔企業集團)；(2). 經濟自由在中國的社會底層城鎮逐漸萌芽，由於並未受到中央政府過多關照與條款限制，因此一方面就地發展的可塑性相當高(也有賴“當地政府領導的高瞻遠矚”和鄉鎮企業集團與外資的灌溉)，另一方面“故態萌發”⁴的依循解放前的經濟市場規模與交易市場習慣，重新再發展的可能性亦不低(如峨橋鎮與劉渡鎮)。

上海區域()的空間劃分與主要的影響效應不包括南京地區，且寧皖的空間發展模式與機制也於上海區域()有所分野，我們認為中國大陸內部的城鎮空間變遷與差異，應無所謂的“通則或制式的發展典範”；九零年代的地方政府在得不到中央政府的大力奧援與政策支持下(相較浦東、蘇州中新高新園區與北京中關村等開發熱點)，為求經濟發展帶動城鎮空間成長，部門與(中級)政府間平行策略聯盟下的時代產物——“經濟協作區”乃因應而生，它克服了政府間的條塊諸侯經濟；(底層)政府也不干寂寞的搭上世紀末發展列車，它配套了無論自主或非自主的集體批發市場（如劉渡木材市場與峨橋茶葉市場，甚至溫州的鈕釦市場）與鄉鎮企業集團（南京江寧的金箔），共構與共生了地方發展上的三

³《明報》：中國大陸小城鎮的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而在全國五萬五千多個小城鎮中。建成了各類的專業和批發市場七萬多個，年交易額有五千億元(人民幣)，產值在五億元以上的有鄉鎮企業有一百多萬家。鄉鎮企業依拖小城鎮而形成越來越大的產業規模，出現了大批年產值十億元，甚至幾十億元的鄉鎮企業集團(鳳凰新聞，1996/8/26: http://cnnews.sina.com/hoenixtv/eadline/1999/0826/197102_b5.html)。

⁴係指解放前原生的經濟市場，往往在經濟改革開放後，又慢慢的恢復到解放前的空間消費生態，當然一部份來自行政力的主導與管理，如上海；而一部份即是本文所謂的自主市場力，如劉渡與峨橋鎮。後者，往往是在經濟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摸索成長，它主要憑藉的發展力量應在於地方政府的權力機制(上對下的經濟放權與隨市場發展而起舞的政策表現)與管理者的視野。

角力量，這是九零年代長江流域中下游城鎮重要的空間發展機制與發現。

本研究分別利用1998年11月；1999年2月、6月等中下旬時間，於南京與安徽諸縣鎮進行田野研究⁵的調查與訪談，因此田野資料的資訊性、時效性與現象，對於當今中國大陸的發展應是重要的指標與觀察，惟部分題材(關於地方政府的“創收”、財稅與“自主性”等課題)，受時間侷限(如，安徽的田野進行與分析觀察原不在本計畫，后因其與南京的空間關連及展現出活躍的市場力，和特殊的長江中游空間發展模式，而納入計畫)與政治敏感度而無法完成。這是要在此表明的。以下，將逐次的概述本研究計畫的分析成果與現象：

三、結果與討論：

(一).南京的空間發展變遷及其與上海的關連性：

南京現有十個市區(六城區、四郊區)，總面積有6,516平方公里，1996年建成區人口有226.8萬人餘、建成區面積為186平方公里，為華東地區僅次於上海的經濟中心(姚士謀等，1998: 381)。南京在近代中國空間的發展過程(同濟大學城市規劃教研室，1982: 173-174)中，幾乎都因其地位的過於政治色彩與意識型態而缺席⁶，我們可以用下列四個階段來評介與說明(同前引，381-385，參圖二)：

- 1.1845年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後，帝國主義勢力入侵，促使津浦路與滬寧鐵路的通車，南京成為南北陸上交通與長江水運的交匯中心，城北大關沿江一帶形成了新市區；
- 2.1927年國民黨定都南京之後，進行《首都建設計劃》⁷—開闢新道路，並於城內分散地建造行政辦公機關。此雖為中國最早的一個城市規劃工作，但在內容與空間形式的

⁵雖因台海兩岸詭譎與敏感的政治氛圍而影響部分書面資料的取得，但是得力於南京大學C教授與K教授的居中聯繫，我們得以與當地的鄉鎮企業、經濟協作區辦公室與相關空間發展的研究單位，以及安徽省相對於本研究對象的各級台灣辦公室官員與地方政府、規劃設計與計劃等部門等協助，完成本研究。

⁶主要就在於其過去為六朝古都 近代又為國民政府的首都，在共產黨解放大陸之後，基於上述兩項原因，以及自古以來的文化古都地景因素，即便是到了九零年代的中期也還未大肆的開發與建設(崔功豪，1993: 280-307；1998/11/12, 1999/4/20與南京大學Z教授與G教授的訪談)。

⁷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將第一批建設工程一律以“中山”命名，如中山碼頭、中山路、中山橋、中山門與中山陵等，1928年2月1日成立「國都設計技術委員辦事處」，於29年12月制訂、公佈“首都計劃”—內容包括城市分區(中央政治區、市行政區、工業、商業、文教與住宅區)，和道路系統等兩部份，城市功能確定為在工業城市(同濟大學城市規劃教研室編，1982: 176)。當時的政治中心與規劃重心設置在中山門外，藉以鄰近軍用機械廠、炮台、機場與兵營，同時也取其地形險要、建都鼎新革故之意；但大量的中央機構實際分散在舊城，這種離開舊城、另建新區的想法是脫離現實的，後來並未實現。

配置上，還是援用歐美城市規劃的理論及方法(Nigel, 1998)，政治意涵勝於實質的建設；例如，未根據現況⁸的棋盤式路網設計、棄舊城更新與既有的設施，而欲往城郊大興土木建新城區等。卅零年代唯一實現的為由下關經挹江門、鼓樓、新街口到中山陵的道路；另一條為從鼓樓到和平門的中央路(也稱子午路)。例如，在山西路一帶開闢官僚等上層階層的住宅區，在城東中山陵與靈谷寺建造道路、綠化、運動場和紀念性建築物等，這是典型的社會主義城市建構方式(French and Hamilton, 1979: French, 1987: 309-320; Gaubatz, 1995: 28-60; Andrusz, et al. (eds.), 1996)；

3.1937年中日戰爭後，南京被日本佔領，作為汪精衛偽政府的首都，期間並無任何的建設，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返回南京，除了興建美軍軍官招待所、國民大會堂之外，還繼續進行《首都建設計劃大綱》，城市空間在八零年代末之前，並無大變化；

4.經濟改革開放後的九零年代，南京成為石化、機械、電子與建材的重點建設用地(姚士謀等，1998: 384；崔功豪，1993: 282-285)；空間發展的特點為依拖主城逐步向主城邊緣、近郊與遠郊小城鎮，以及西北(浦口、大廠)、東北(棲霞、龍潭)與西南(雨花台往祿口機場、板橋)，據我們的觀察，上述三個發展軸向(參圖二)，恰好都是主要的三個經濟開發區(洪啟東、王鴻楷，1999: 45-60)的位置所在，這也說明了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設置對於地方政府經濟發展與擴充的加乘效果。而在1996~98年期間⁹，新制訂「新三年規劃」¹⁰針對沿(長)江發展(如，河西區、下關區與幕府山區)，作整體環境保育的中長期永續發展構想，此等計畫亦是華東地區的首創。

南京與上海的空間發展差距表現在：(1).轉換企業經營的機制¹¹—南京僅在產權制度的“股、合、嫁、轉、賣、租、包、兼”八字打轉，並未如上海在政企分離上，企圖建立明確的產權關係；(2).商品的產銷管道與交換體系—上海擁有交易、價格、信息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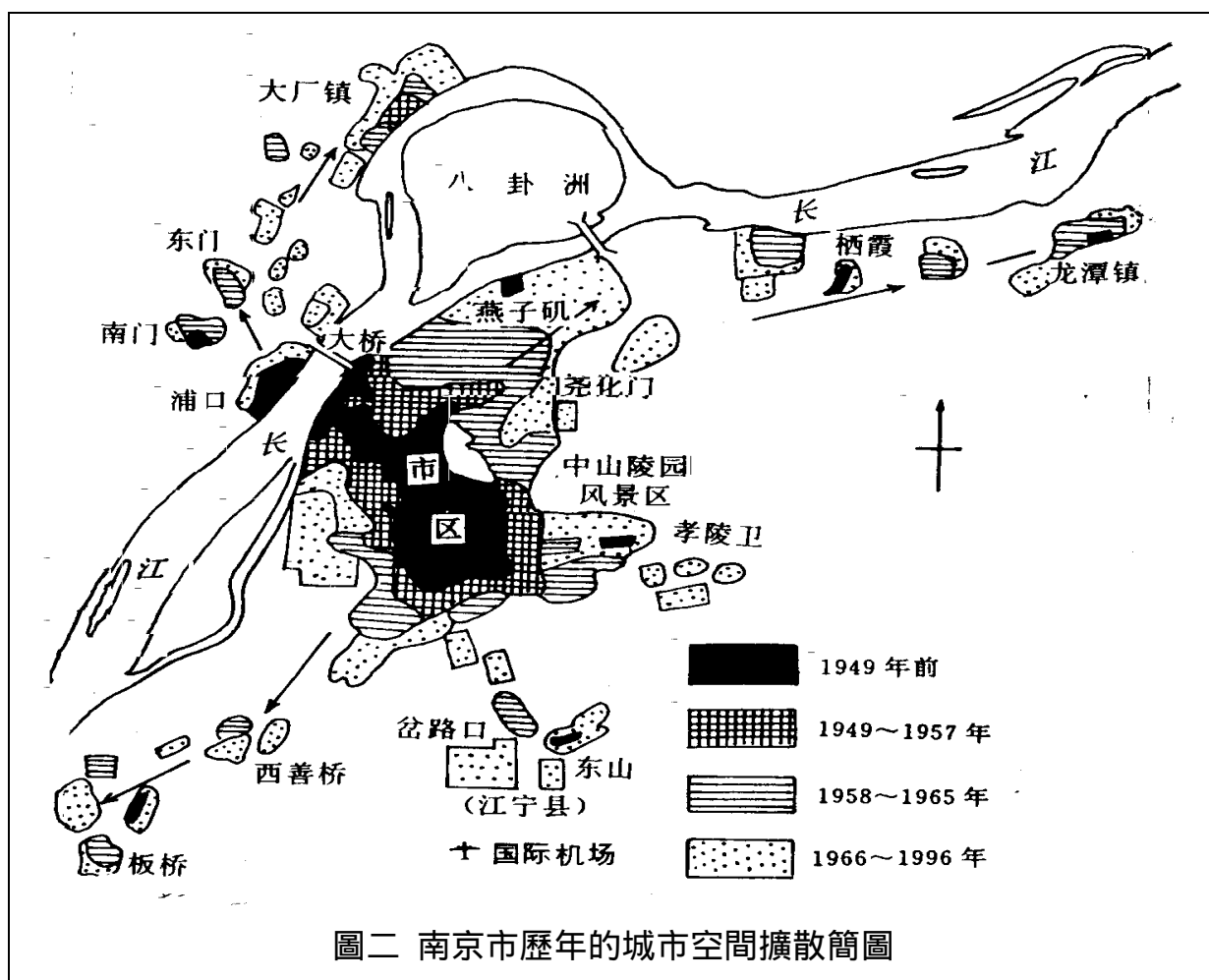
⁸南京城的道路為歷代不斷擴建而成，系統亂、寬度僅十公尺左右，且有不少地方多為民宅侵犯。另雖將中央政治區設在中山門外(的郊區)，但實際上偏離事實，後來也從善如流的更改至中山門內的故明宮之內(同前引，179)。

⁹來自1999/2/2對南京市計畫委員、國土環境規劃處高級官員L君的訪談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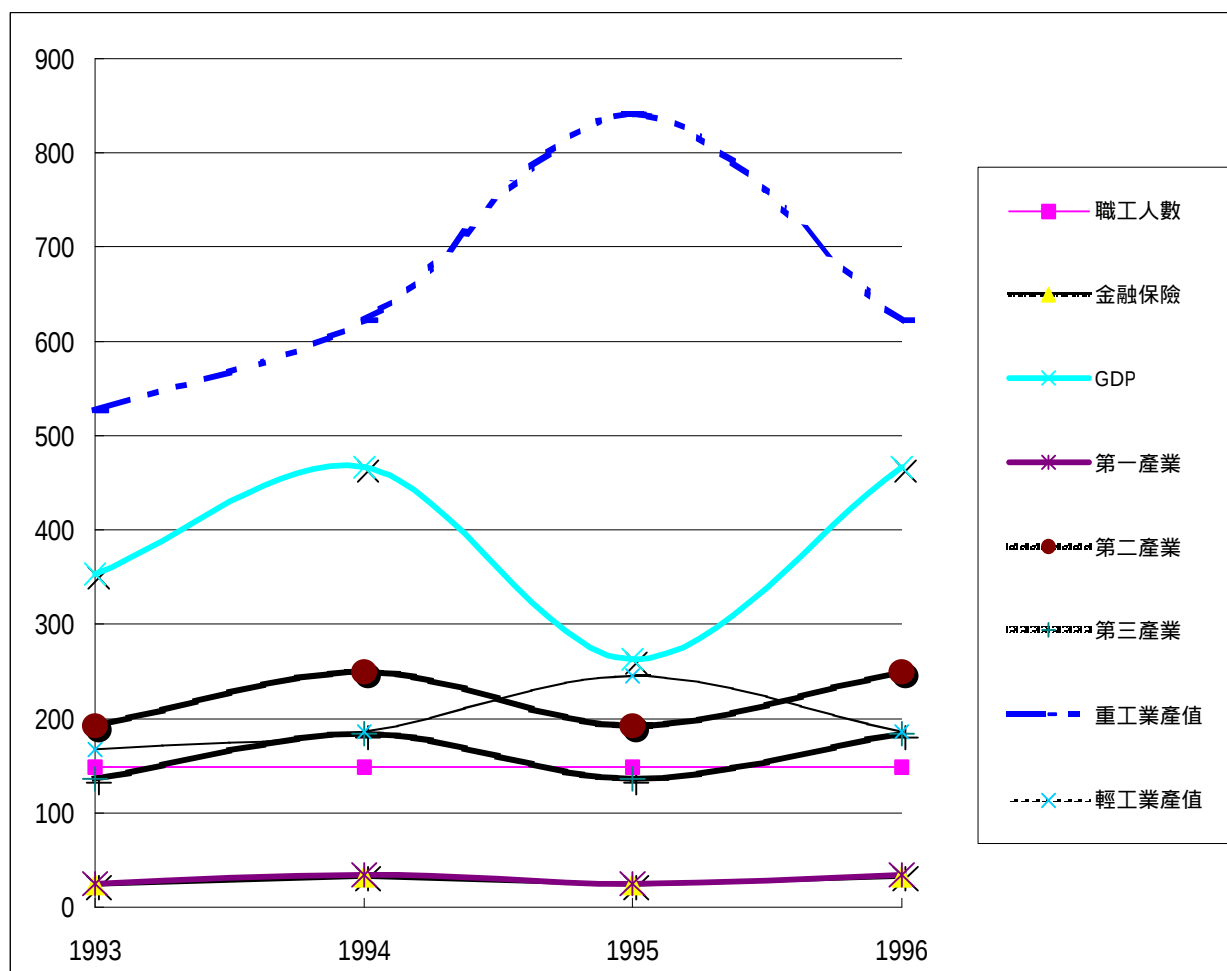
¹⁰1998年由省計畫委員與省建設委員共同制訂1999~2001年的《新三年規劃》，這是省政府要求的形象工程。透過市政府實行目標管理的國民經濟指導性計劃，於98年12月9日成立幕府山環境保育辦公室，目的在透過三年的期限，強化濱江城市的投資環境（如結合環境保育與產業休閒經濟的渡假社區）與（綠色）風貌，例如，停止當地的礦石開採權、加快基礎設施建設。

¹¹以1993年為例，上海較之南京表現在：股份公司(118/21家)、上市公司(92/3家)、被兼併國有企業數(456/24家)、各類股份合作企業(2,993/1,325家) 均要搶眼(仲玉琪，1995: 32)。

管理示範等中心，尤其表現在金融、消費產品、原料、股票、證券、工業材料等資訊、技術與勞動的交換和流通上面，但是南京卻欠缺上述完備的市場機能活動(仲玉琪，1995: 31-35)；(3).(外向型)經濟規模、基礎設施的完善與增長速度—這方面的差距雖然立基於城市層級，可是上海市(浦東)明顯的在中央政府優渥的政策栽培下，的確是令南京此等地方政府相當眼紅；例如，表現在上海的“二級政府三級管理的簡政放權制度”、爭取外匯投資時的配套政策(指中新高新技術園區)，和隨市場聞雞起舞的獎勵條款(王鴻楷、洪啟東，1998)，這些都是南京所欠缺的。由於先天體質的差異(區位與中央政府態度的差異)，南京經濟增長的速度與區域空間的發展自然不如上海迅速，是故；(4). “經濟協作區”乃因應而生—這是地方政府因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自我求發展，進而聯絡區域間其他地方政府，將區域內部的產業經濟之策略聯盟、合縱連橫發展與產銷政策作一通盤檢討，與策略性的跨政府與區域合作之區域資源的建議性規劃與設計，它並非來自中央的指令性計劃，也超越板塊經濟的門戶之見的局面。



資料來源：姚士謀 等，1998: 384。



圖三 南京地區九零年代的產經發展統計簡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寧皖新興區域城鎮的空間聯盟發展模式——“經濟協作區”之空間現象

“經濟協作區”的出現，其實早在1986年即為一種地方政府與部門間“平行”的經濟聯盟策略，當時中央的計畫委員有鑑於“板塊經濟”對於地方發展有所制衡(洪啟東，1998；趙曉斌，1995: 12-39)，乃針對長江流域的大中小城鎮提出：城市間應的互相整合發展的構想，計畫以“蘇皖贛”接合處的「南京經濟區」為中心，作城市間的經濟協作與交流¹²。另一方面，瀘杭寧一帶自古即是江南的經濟金三角地帶(奠基於以前太湖魚米之鄉)，有很好的經濟發展潛力；惟上海的經濟輻射發展範圍有限(主要乃因戶(口)籍制度所致)，所以蘇皖贛一帶即成了鄉鎮企業的落腳生根處(黃明達，1993；陳吉元 編，1988)，當然還有部分因素是來自六零年代知識青年上山下山運動的技術支援，但是越朝向內陸則限於交通與開放程度，且規模經濟不倖東南沿海的迅猛現象。

¹²來自1999/1/29對安徽城市規劃設計院高級官員P君的訪談記錄。

簡言之，此處的發展該開始為來自民間(或說地方政府)的力量，並進一步的透過國家政策予以收編與規範；例如，當初(80年代中期)安徽的浣江地帶因其地理位置較靠近南京(全國綜合實力排名第五，公務員的年均收入為2萬元人民幣、農民約3千元人民幣、貴州則是1千元人民幣)，著眼與未來上海的吸引力，在滬寧公路¹³還未修建完成，地方(政府)就把“寧合(肥)”公路給建構起來。會有如此的動作，據解釋(同註11)乃是“錯過幾次的發展機運”(安徽省的發展以皖北、皖中為重點，後改以蕪湖市中心時，發展東部地區，則把它當作中部，然近幾年來，滁洲市的發展堪稱是安徽省最快的)，而欲搭上此次契機。

據我們訪談的瞭解，全中國大陸共有142個地方性的經濟協調組織，但是只有上海政府對於區域土地、或地區土地的規劃權和批地權有“放權讓利”，而且自“解放”後，即有類似台灣區域計劃的空間資源分派建議(如表一)，這是指導性的計畫構想與學界的政策建議，惟是否“按表實踐”則有待進一步的資料蒐集與分析。南京的地區發展以1994~96三年為高峰期(如前之圖三)，這是江蘇省政府在此時期支持高密度的發展結果；然而這也與此時期的“經濟協作”有關。對於“經濟協作”的概念，可以追溯¹⁴至1985年時期的上海、南京、武漢與重慶三省市透過各地市的計劃委員¹⁵，成立「長江流域(四個)中心城市協調會」開始，該組織主要著眼南京位於：(1).長江三角洲的優勢地位¹⁶；(2).交通、訊息與通訊的便捷性—南京的新圩港(這是重慶、武漢的貨運的中繼港站¹⁷)，以及其區位在中國鐵、公路與航運的節點地位；(3).高含量的教育科技—僅次於上海與北京，目前的科研單位有五百餘家、32餘萬人的技術人才；(4).經濟產業具有優勢的地位—如，電子、石化工業(佔全中國的第二位，以下同)、汽車(佔第五位)；這樣的城市綜合實力表現在年度人均GDP值¹⁸為716.6億元人民幣(上海為3,360億元人民幣)。

¹³江蘇省出資79億人民幣、南京則出8.5億人民幣。

¹⁴由目前服務於南京市計畫委員會的高級主管W君於1998/11/12的訪談記錄。

¹⁵由當時的體制改革委員副主任提出，(11年來)每年開會一次，由各市輪流做莊，就區域內各大小城鎮的旅遊業、七十餘種商業商品流通等科技與商品市場的經濟流通分工，作跨地市的行業發展(同前註)。

¹⁶例如，珠江三角洲的廣州、香港；環渤海地區的天津、大連；上海區域的蘇錫常地區、上海、南京與杭州等三個長江三角洲主要經濟地帶；東部沿海城市與長江沿岸城市所構成的T字型城市區域地帶。

¹⁷長江一橋在建造之伊始，橋面距江面只有24公尺高，導致長江二橋也需變相的有此高度的限制；故由外海而來的航運貨物，需在號稱內河第一大港的南京新生圩港轉運，以便進入重慶與武漢(同上引)。

¹⁸數值並無“實質意義”，因南京“市”帶有五個貧窮郊縣，蘇州市帶有6個富縣；當計算城市經濟時，並未將市域範圍細分，故城市人均GDP值的比較，並無意義。目前中國城市內部以三產為主的城市依序為：上海、北京、天津、廣州、瀋陽、武漢與南京(按1998/11/12對南京計畫委員處W君的訪談)。

由上觀之，經濟協作的積極動力，應是來自南京地方政府主動的經濟發展構想，而鄰近的皖南地區因地處山區，並無所謂的區域中心可以依附，此刻恰好搭上南京欲擺脫“十朝古都的政治中心”空間意識型態，而朝區域經濟中心的發展目標，是故雙方一拍即合的譜下此空間聯盟策略¹⁹，共創寧皖“經濟共同發展體”。

表一 中國大陸自“解放”後的行政經濟協作區劃的演變過程表

階段	年代	區劃重大措施
1	1949年~	1. 六大行政區(經濟區)；華北(5省2市)、東北(6省4市1行政署)、西北(5省1市)、華東(4省2市4行政署)、中南(5省1市)、西南(4省1市)。 2. 內蒙古自治區； 3. 西藏地方。
2	1954年~	1. 由原49省(含台灣)，縮減為32省； 2. 撤銷六大行政區行政委員會建制； 3. 撤銷六大行政區(經濟區)；西藏地方。
3	1958年~	1. 七大經濟協作區；華北、東北、西北、華東、華南、西南、華中。 2. 成立「協作委員會」； 3. 成立經濟計劃辦公廳 ²⁰ 。
4	1961年~	1. 六大經濟協作區；華北、東北、西北、華東、中南(華中、南合併)、西南。 2. 撤銷協作委員會； 3. 成立中央局 ²¹ 。
5	1970年~	十大經濟協作區；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西南、西北、中原、山東、閩贛與新疆。
6	1978年~	六大經濟體系（按全國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決議）。
7	1982年~	國家計委與統計局依 關於沿海與內地劃分問題的通知，將全國劃分沿海與內地兩大區域；規定：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與廣西等11個省市自治區為沿海地區，其餘為內陸地區。
8	1981~85年	全國相繼成立七大經濟協作區： 1. 華北區(1981)：華北經濟協作區—3省區2市； 2. 東北區(1983)：東北經濟協作區—4省區； 3. 華東區(1983)：上海經濟區—5省1市； 4. 西南區(1984)：西南經濟協作會—西南5省區6個地方； 5. 西北區(1984)：經濟技術協作聯席會—5省區； 6. 中南區(1985)：經濟技術協作聯席會—5省區2市； 7. 山東區(?)：由山東省自行協調組成。（?表未知年）
9	1986年~	七五計劃 將全國劃分為東部沿海、中部地帶與西部地帶等三大塊； 東部沿海為：京、津、冀、遼、魯、瀘、蘇、浙、閩、粵、桂等11個省市； 中部地帶為：黑、吉、內蒙古、晉、豫、鄂、湘、贛、皖等9個省區； 西部地區為：陝、甘、寧、青、新、雲、貴、川、藏等9個省區。
10	1990年代	全國相繼成立七大經濟區域： 長江三角洲與沿江地區、環渤海地區、東南沿海地區、西南和華南部分地區、東北地區、中部5省地區、西北地區。

資料來源：黃作平，1998: 25-27；本研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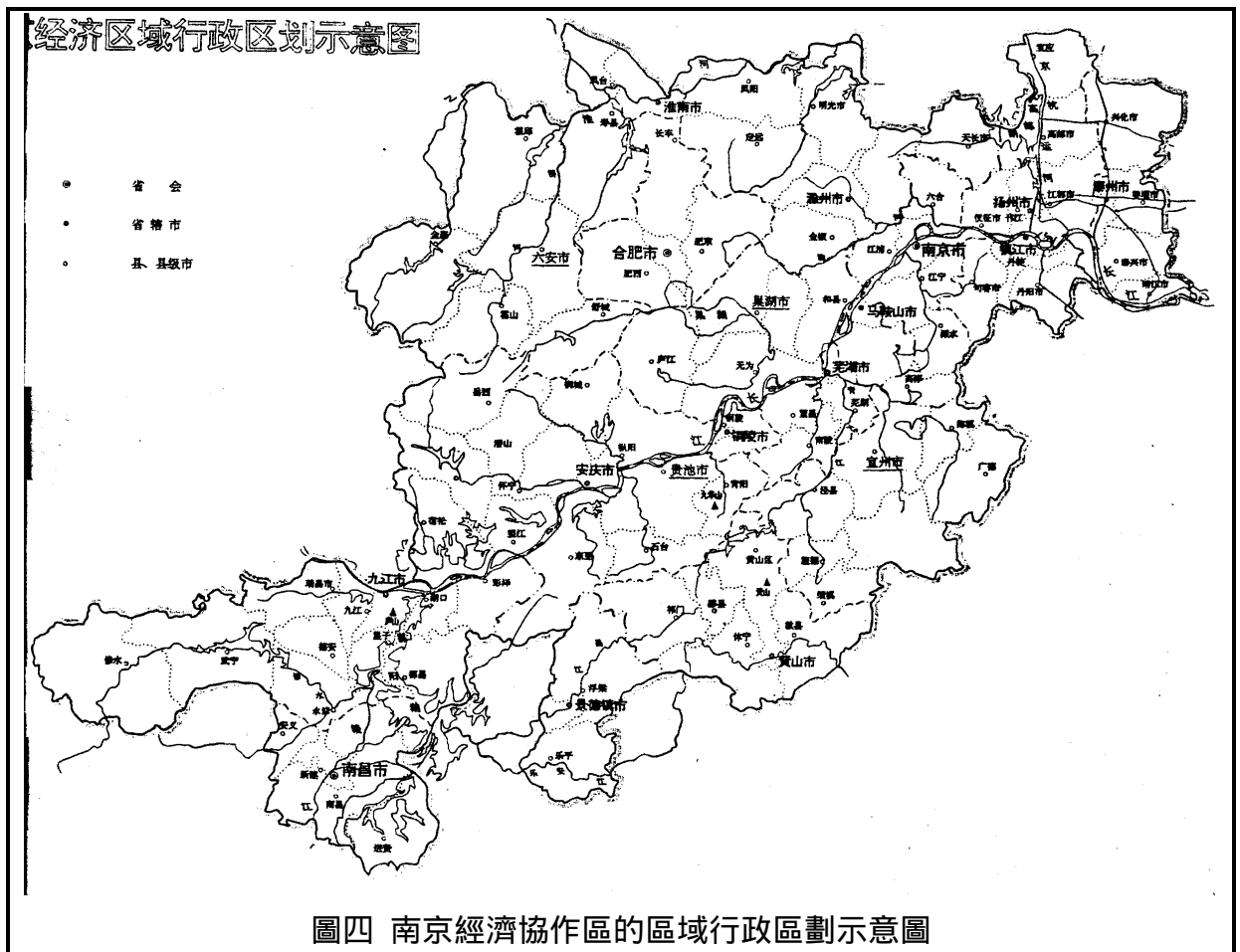
¹⁹我們可以看到當初四個沿江中心城市的發展協調會，演變至後來，僅剩南京積極的運作與帶頭發展。

²⁰接受國家計委的領導，對下指導各省級計委等經濟業務部門，此為具體操作部門。

²¹協調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並開展協作業務。

1990年以南京為首的“經濟協作區”²²完成了19個地市的區域協作計畫，1997年再修正為18個地(級)市的經濟發展計畫；上述地域(如圖四)共計16萬平方公里 6千餘萬人。

“經濟協作”的計畫目標為：(1).與國家保持聯繫並引起“重視”，欲透過經濟的產業分工，反應地方的實際資源與發展狀況；(2).保衛南京在長江中下游地位的鞏固。我們可由南京的祿口國際機場的設立看出端倪(惟目前僅有至日本橫濱的國際線，其餘則是國內航線，它被中央定位為上海的備用機場)，這是源自國家計委從區域經濟的發展觀點(兼顧馬鞍山、無錫，蘇北地區並無像樣的國際機場)，後來才沿著機場沿線蓋公路。



圖四 南京經濟協作區的區域行政區劃示意圖

資料來源：南京市計畫委員會提供（內部資料），1997；本研究繪製。

²²透過由南京計畫委員的內部計畫 - 《聯合發展規劃》更可梳理此處交織的地方聯盟關係：南京經濟區(採用當地「南京經濟協作辦公室(Economic Cooperation Office)」的用語與界定。)西側位於長江中、下游的接和部；東端與長江三角洲相連；具體而言，區域含括了三個省會城市：南京、合肥和南昌(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十二個省轄市：鎮江、揚州、泰州、蕪湖、淮南、馬鞍山市、銅陵、安慶、黃山、九江、景德鎮與滁州市；四個地區：六安、宣城、巢湖與池州；共轄有十七個縣轄市、六十一個縣，土地總面積有15.61萬平方公里、總人口6,384.33萬人餘，分佔全中國的1.63%、5.27%；1995年區域內的GDP值為3,137.20億元，佔全中國的5.48%；區域內部的人均GDP值為4,937元，略高於全中國平均值4,729元（南京市計畫委員會提供）。

經濟協作區的觀念是外引(資)內連(經濟協作)，透過區域內部的產業結構調整、資本運作、高新技術、資訊與勞動資本的流動，作統籌的區域計畫與建議；甚至對區域內部產銷管道、對口支援項目和企業的結構性調整和兼併、擴充²³起了作用，且活絡了地方(國營企業)的產業經濟。此等空間機制盛行於皖南地區，且有所謂的「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具體的在行政事務上予以操作，例如，表現在招商會、產學研的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城鎮間的產業技術開發區的經驗交流、考察與合組「開發公司」。換言之，經濟協作的空間策略聯盟關係乃表現在區域內部：(1).資源的情報交換與規劃；(2).產業經濟的結構性調整與對外來資本的中介及(透過行政力來)聯合發展；(3).交通運輸與集體消費設施的興建；(4).城鎮體系的規劃和旅遊文化工業的組建；(5).環境生態的保育與永續發展的空間實踐。雖說上述聯盟策略的成敗與否乃維繫在「年度的沿(長)江市長協調會」，且市場經濟發展與資本挹注猶需搭配地方的行政力，但是這是中國大陸在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黨政企共合體)，惟它的確展現了地方旺盛的市場化、經濟化與自主性的產業聯盟商品化的空間經濟效應(南京市計劃委員會等，1997)。

(三).金箔集團的鄉鎮企業與自發性的全國市場中心之在地化市集空間

1.金箔鄉鎮企業的地方發展模式：

南京的AA金箔集團起源於五零年代分佈在江蘇省龍潭附近的個體鄉鎮企業，當時透過縣工藝局組成合作社(工廠)，才開始有規模的生產；1983年該處因大水災，而遷徙到原為墳地的江寧縣現址。據聞本土有卅多家金箔店都是來這裡取材的²⁴，且生產的金箔商品有70%，外銷台灣、香港、義大利、北美、南美與日本等地，這是以外銷需求導向為主的鄉鎮企業，與東南沿海的鄉鎮發展模式雷同；但商品的種類及集團化企業經營則較後者“高明”(如后)、規模也較大；例如，發行《金箔報》與《中國捲煙材料報》，另，全世界的金箔展覽大會也於今年的4月22日於本鎮召開。此等現象也說明，(金箔)鄉鎮企業一旦坐大之後，其似乎是可以跳躍區域中心城市，而直接與國際接軌、並軌，甚至脫軌於原社會主義市場經營形態。

八零年代該鄉鎮企業有195萬元(人民幣，以下同)的年產值，但年虧損率為197萬元，當時尚屬鎮企業還未脫勾於地方、也未集團化，但中央指派Z君管理該企業，採取迎向

²³如合肥肥東縣HH化肥廠與上海KK造紙廠的聯盟，共建濾紙生產線；合肥的LL集團兼併蕪湖PP洗衣廠、隨後也併吞重慶UU洗衣廠，而促使該廠的轉虧為盈(合肥市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內部資料，1999)。

²⁴1999/2/3對南京AA金箔集團高層官員C君的訪談資料。

市場化²⁵的企業管理制度，而開始轉虧為盈，也集團化了該鄉鎮企業。該金箔企業一路由鎮屬、縣屬的直管企業走來，透過集體化(職工集資買政府的部分股份)的資產積累而有現在的集團化規模；1994年演變為江寧縣工業局所屬企業，黨委書記兼總經理，企業行政權直屬縣長管轄(過程的演變因故，並未在本研究深究；但基本上，該金箔集團的營運與行政、財政和人事權仍在縣政府的控制)。會有上述的商品的積極市場化、但行政決策的集中化(即本文後段所稱之“半市場化、半集權化的決策過程)的“江寧金箔鄉鎮企業現象”，則歸因於金箔產業在中國大陸被視為“特種行業”(受法令所保護)，不准合(外)資經營，至於稅款則也需按一般國稅與地方稅上繳(因“敏感”本研究無法得知)。

金箔集團對於地方的貢獻表現在：(1).1996年縣屬國營企業的電機廠要倒閉，該廠長就找縣政府，縣府“希望”金箔集團以其財力奧援力“託管”該電廠；(2).有名的“湖熟板鴨”(南京的食品龍頭產業)由於內部幹部的管理不當(把板鴨當人情送、記帳行為)，虧損近千萬元人民幣，至1998年也由集團公司“奉命接管”；(3).對地方基礎設施的投入(例如，興建“金箔路²⁶”)，更是不勝枚舉；(4).1994年該集團透過內部職工集資²⁷與吸收鄉鎮資金(約1,800萬元人民幣)，在地區附近籌集“KG小商品市場”，藉由市場服務之消費對象為地區勞工與外地到此的農村勞動工，開展地方的商業地景與提升地方消費力，次年上繳480萬元人民幣的稅給縣政府，成績相當可觀²⁸。

上述表明了鄉鎮企業也可化身成為所在地政府之財政後備軍與救火隊，也突顯作為特種資源的鄉鎮企業，受到地方既有的保護政策而成為市場競爭的利器，當然這也須倚賴決策者與管理者的“半集權、半市場化的睿智管理措施(如Z君)”及商品技術的不斷提升。例如，透過行政權與經濟權兼併安徽的TT醬菜食品業，改生產“快餐鍋粿”；進一步，集團公司打算三年內股票上市²⁹。但“黨政企一家親”的鄉鎮企業發展模式，如何脫勾、轉軌，而走向股票市場化呢？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²⁵據悉1983年為市場引導企業發展的趨勢，因此整個鄉鎮大量的打造金箔；1985年開始研發鋁箔替化、江寧縣的鐵化鋁廠開始對外擴張；1988, 89年的金箔加工(招牌、畫匡)營造了現今旺盛的金箔街景。

²⁶原名為外港東路，花費數十萬元人民幣建成，並買下路名使用權。

²⁷向職工保證年獲利兩成。金寶市場的產生著眼於產生鎮上的人氣，增加小商品市場的流通。

²⁸事實上，當研究者於今年二月中旬於該鎮進行田野踏勘時，所見到的城鎮地景也誠如C主任所言，沿途偌大的市集與廣大的消費大眾，以及當贈品的數十輛“桑塔納”汽車，交織著活絡的消費氛圍。

²⁹據悉現今金箔集團的最大經濟支柱，並非金箔而是捲煙材料與金柱線(香菸包裝上的錫箔與易開拉條)，這是1985年開始發展的，迄1989年漸成氣候。

2.地方自主性的茶葉市集市場之全國中心發展模式：

安徽省的峨橋鎮地處皖南山區與長江流域邊，明清時代就有商家經營茶葉的生意，傳統都是透過蕪湖市而將商品輸出(內銷市場為主)。經濟改革開放後，茶商多數為周邊農民自發性的經營行為，至九零年代中期，本地逐漸發展為全國最大的茶葉交易市場(有江南第一茶市的美名)。目前鎮上的人口約一萬八千人餘，然而，這裡卻聚集了每天約有一千餘人的茶膳與茶製品的交易，中共民貿部特批「全國最大茶市」之殊榮於本地。每年的清明時期，當新茶上市時，這裡即是人山人海，每天據估計應有1,500萬公斤的茶葉交易量茶商的個人平均年收入為2~10餘萬元人民幣。由於，此處並非茶葉的生產地，只是個“交易”的地方市集而已，但是卻成為全中國的茶市交易中心之一，這是該發展模式吸引本研究的地方。

峨橋鎮政府在1991~92年開始作販售商品區位的集體規劃(前市場後倉庫)，提供茶商之硬軟體設備(倉庫、旅社、商店、餐廳等相對應的配套措施)，透過當地的農戶(500多家)與外來的茶商(約有2,400餘戶)共同造商品房，作為既可住宿、倉儲與交易的三合一場所(一棟三層住宅、百餘平方米約三萬元人民幣)。1950~60年代這裡僅有初步的茶葉加工，80年代之後這裡的政策作了調整，發展集體貿易與商品經濟，並吸引當地農民在農閒之餘可以經營茶葉商品，以增加收入和轉化勞動力，遂逐漸發展為現今的市集規模³⁰。

除了上述地方府積極的市場化之外，“徽派文化³¹”的禮儀之道、富民政策；行之有年“移民在外的安徽人打拼精神³²”文化；以及外地有2~3萬本地人推銷茶葉的緣故，這些都是接促的峨橋可以成為“江南第一茶市”的潛在因素。換言之，地方商品化的市場規模一旦擴大之後，中央也會覬覦此等的經濟效益，如北京當局³³曾在蕪湖市設置“北京茶市”，但經營情況並非理想，此等現象也說明市場自發性的經濟市場(如峨橋)勝於政策導向人為市場(如北京茶市)。

七零年代透過農村集體承包制，迫使農民走向市場，農民在農閒之時即成了茶商，據估計本地約有60~70%的農民有上述產業轉型傾向³⁴。“江南第一茶市”的成功之道，我們認為應該有下列四項重要的地方發展機制與之配合：(1).鎮政府“讓地與民”提供

³⁰部分原因為本地有近2~3萬人在外地推銷與經營茶葉商品，本項機制為任何商品經濟所難以取代的。

³¹一家人經商，一個帶一個的灰商思想。

³²八零年代“安徽小保姆”四處流竄，藉以靠外地打工來彌補當地貧困體質之原因。

³³中共人民大會代表王光英先生曾到此地考察發覺此地不產茶，卻儼然為江南第一茶市。

³⁴1999/6/18對該鎮高級官員K君的訪談資料整理。

部分的無償土地，供全國各地的茶商前來交易，並且出讓商品房與交易商，使其有落腳與儲存商品的空間；(2).本地優異的交通區位使然：鐵路與公路僅在幾尺外(車站就在百米之處)，可直達南京和上海，以及蘇錫常各地，但令人納悶的為該地現有的基礎設施與道路建設，僅是六~十米的產業道路，與我們所想像的是利用便捷的高速公路與網絡，相差甚大，即便附近的火車站也僅是鎮級的地方型車站；(3).本地的另一項經濟命脈為水泥(廠)，年產值約有四萬多元人民幣，較少居民從事該行業，是故捨工、農就茶(商)在此地就更具合理性，而大多居民還是以務農與農閒時從事茶商生意為主；據K君表示：批發價50~60元人民幣的茶葉，市場上可以販得100~200元人民幣，遠比進廠或務農來得實惠；(4).稅收在本地所佔的比例較小(稅率統一為17%)，一般可分定稅與合稅兩種，前者為確定稅額再予以徵收，後者為不定期的調度稅率，通常徵收對象為茶葉大戶。一般來說，在茶廠已被徵收6%的茶葉商品稅，到了市場就很難再被徵稅，除非是茶葉大戶，是透過核定的稅基而予以課稅。上述的稅賦對於茶商而言，並非大負擔，相反的，透過“納稅³⁵”的手段，使茶商認同該地、地方政府也“名正言順”的提供必要的“設施配套”與“市場規範”(亂收費與集體壟斷商品或市價)。

茶市刻正進行第二期的擴建工程，“峨橋地方市集的全國中心化發展模式”，應在於：(1).峨橋原有的茶葉發展歷史；(2).鎮政府的(無償)市場提供與相關生活配套措施；(3).二~三萬之在地人，在中國大陸各外圍地區的銷售網與“在地行銷”策略，例如，宣導峨橋“買全國賣全國”的口碑，如以清明節作為茶種之劃分→之前有西南、貴州、廣西與廣東的春茶；之後，則有浙江、蘇南與皖南的茶系進場；(4).交易場所的治安與社會管理環境；(5).隨市場機動調整的彈性化之正規化的稅收政策→既保證當地的稅賦財政收入，同時也確保交易商在“有利可圖”之後，才行交稅之實；(6).由於茶商之間都是自發性的市場交易行為，市場的敏銳性較高，機動性較強，重視“策略聯盟”與“媒體造勢”，這是有別於過去封閉的市場化經營策略；例如，最近成立的“茶商行業商會”有助茶葉訊息、商機與組織的協調發展；透過中央廣播電台上媒體打廣告。

總體來說，鎮政府對於市場的助力主要表現在“基礎設施”的配套，亦即，“市場配套帶動茶葉發展”，先提供交易市場與地方的行政保護力³⁶，讓交易商在場地、基礎

³⁵其他，還有「衛生稅」必須繳納，這是按門面來收取的清潔費；連擺鋪在路中間的攤販也必須繳納；另，還分“條”的縣與“塊”的工商所應支付的「工商管理費」→主要為核發執照、協調交易商之間的爭執與管理等公共性事務。但據反應，前述的稅額基本上都不高。

³⁶單純的僅以茶賣茶是難以應付爾後的市場經濟，必要時是要透過行政力予以“配套”，例如，道路的修建與市場的經營管理，像“商貿大廈”的經營就是作些茶葉加工，提高茶葉的附加價值，又如提供

設施與生活空間等方面得到保證；繼之，再由地方政府集資籌組“商貿大廈”企圖提供現代化的交易場所與設備，以取代露天的市集。地方政府靈活的透過行政資源和既有的土地產權，提供住宿、交易場所、倉儲空間、餐飲服務、衛生管理 等相關茶葉的“一條龍”似的配套商業服務，滿足形成茶葉市場的外在需求和茶商的生活消費設施，一舉將本地推向“江南第一茶市”的寶座。但是令人質疑的是，當地對於規劃“茶葉開發區”的動機與意願，就顯得意興闌珊（即便有8平方公里的預留空間），但是如果是一般常見的透過招商引資來興建工業區，則相當有興趣，此有待進一步的瞭解。

3.地方自主性的全國木材市集發展模式：

安徽省無為縣劉渡木材市場(3公里×400公尺)地處無為縣劉渡鎮境內的外江灘上，與銅陵市隔江相望，是蕪湖至安慶的必經之處；它前臨長江、後連內河，水路交通十分便捷，也是木商理想的經營場所。劉渡木材市場興起於1970年代末期，在該縣縣委、縣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重視下，在1983年迅速發展起來，現在蔚為全中國大陸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場(劉渡鎮鎮政府1999/6/16所提供的招商資料)。1989年被中共「國家工商局」列為“共和國之最”(商品評比的獎賞)；1988, 92, 95年相繼被授予“全國文明集貿市場”、“萬里長江一明珠”；1994年被安徽省政府命名為“十強專業市場”，1997年由中共「貿易部」審核，確認為“國家級”批發市場，名聲之響，可見一斑。因此，外人只知“劉渡(鎮)”而不知“無為(縣)”，確有其道理。

劉渡木材交易市場方圓數百公里內，既無林產區、也非主要的銷售地點，然而它卻是全中國大陸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場，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我們的田野分析與初步的觀察所知，此等交易生產/消費空間的誕生，應可分為傳統的販售歷史過程，以及得利於改革開放後的市場經濟掛帥使然（類似於前文的娥橋茶葉市場），因勢利導的促使劉渡木材交易市場能夠迅速的在九零年代走向市場。劉渡木材市場佔地面積約130萬平方公尺，上市之木材主要有杉木、香杉、雲杉、柳杉和各種方木、原木、木條及舊房料等20餘種，長年木材儲存量為15萬立方公尺、旺季可達10萬立方公尺；日銷售量旺季可達3,000立方米，成交額4千萬元人民幣(劉渡鎮鎮政府，1998)。它以長江上游的木材產地為依拖，以市場貿易為導向，往內地和下游“雙向”輻射，觸角伸向全中國；目前木材的銷售網絡已跨18個省市，如雲、貴、川、湘、桂、鄂、贛、蘇、隴、魯、浙、閩、皖、滬與津，共200多個縣(市)、日銷售木材平均為1,700立方公尺、成交額為230萬餘元人民

無償或低廉的交易場所供茶商交易等(1999/6/18對該鎮高級官員Z君的訪談)。

幣；日人流量達8,000人次，旺季更可達萬人次；1997年成交量為61萬立方公尺，成交額有7.4億元人民幣³⁷；圍繞市場服務的第三級產業人員有500餘戶、共2,000人餘；木材交易的經營主體有國有、集體、私營企業與個體工商戶共2,000多戶、有萬餘人(安徽省劉渡木材市場管理委員會編，1998)。

劉渡一帶有群眾自發販運經銷木材的傳統，從1930年代就有私人在離劉渡下游一公里的鳳凰鎮開木行；50~60年代國營木材公司應運而生，不過生意並非熱絡；70~80年代初期木商著眼於長途販運木材的利潤，開始從事交易³⁸(劉渡鎮鎮政府，1998: 2)。經濟改革開放後，中共對於木材經營、價格控制、商品流通的逐漸放鬆(同上引)，無為縣政府順勢的在1984年確立“放水養魚”的市場穩定政策，一方面明確的表示木材長途販售為合法的，有利於增加群眾的收入，應該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會同有關部門深入林產區和沿江市縣，協調“關係”、打通運銷渠道，遂使上游林產區與沿江市縣相繼撤去關卡；同時也規定木材交易(商)市場，除工商稅務部門按規定收取稅費之外，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插手收費(例如，地皮費、青苗費、攤位費與過路費)。尤有甚者的，並且在92年的「木商代表會」上宣布現有的優惠政策五年不變(王士新等，1992)。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表現在對內—安定市場，與對外—市場交易、增闢財源的策略，尤其裨益於劉渡木材交易市場的永續發展；前者表現在對木材交易市場的管理與服務，例如，縣政府召集工商、公安、稅務、金融、林業、商業、航運與交通等部門和所在地鎮政府，成立「劉渡鎮木材市場管理委員會」(簡稱“市管會”)共同協調處理一些彼此間重要的職責與利益等問題；後者則是由縣政府派出副縣長組織考察團，南下前往四川木材產區考察國營林場，開闢材源；同時順江而下，考察貨品銷售的交通環節，例如，透過沿(長)江地市縣林業廳、工商部、航運、公安與鐵路等負責人，參加「劉渡木材市場工作協調會」，減少外省地市木材在長江水運中的阻滯現象，為劉渡鎮穩定木材的貨源與疏通渠道(同上引)。前述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在地富民政策³⁹”之進一步喚發出市場的活力，並搭配劉渡木材交易市場的經營特點“深購遠銷”—有批木材運銷隊伍為闢林源，遠赴越南與緬甸邊界採購，並且在雲南承包林場。這批木材銷售隊伍(據估計

³⁷從1978年迄98年的成交額達144億元人民幣，而圍繞在第三級產業總產值達32億元人民幣，上繳國家稅額達2.3億元人民幣(劉渡鎮鎮政府，1998: 1-2)。

³⁸當時木材作為中共國家重要的物資，實行計畫管制調撥，林產區與沿(長)江通道均設置了重要的關卡，木材市場也就只能在“半開半閉”的情況下進行；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九零年代，縣政府會召集林務、稅務、航管、公安與工商等相關部門組織「劉渡鎮木材管理會」的原因了。

³⁹允許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並且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政策下，促使這批木客商如魚得水。

約有2,000多戶，一萬人餘)具有相當的市場嗅覺與豐富的木材交易經驗，能共同的組建銷售網點，終究能使劉渡揚名在外。

綜觀劉渡鎮木材交易市場可以迅速的走上市場經濟化的原因，初步的分析與判斷，除了歸功前述的歷史因素、黨政企之地方政府的靈活的市場調節機制，以及鎮政府提供8個搬運隊⁴⁰共千餘人協助木材搬運，和治安良好的交易環境與低廉(近似免費)的土地供木材交易商使用，功不可沒之外，還應歸諸於劉渡鎮本身的優異地理環境和便捷的交通環境。劉渡木材交易市場在長江邊上展現出一道“弧形”，留下數千公尺的江灘，可堆放數萬立方公尺的交易木材，且可供1~5千噸貨輪通航，促使劉渡與長江沿岸的各大中城市與港口皆可直通，裨益於木產品的商品流通。

綜上所述，無為縣與劉渡鎮等地方政府透過在地的行政保護力⁴¹(例如，前段論述部分、治安的保證、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的提供⁴²)與木材交易作業程序的簡化⁴³，以及對土地的管理權(例如，木材交易市場的近似無償提供)，終究能結合地方特色資本⁴⁴與當地勞動力於一身，再造地方產業發展的遠景。此等發展過程與機制，並不多見於西方資本主義城市，即便是同屬中國大陸的東南沿海地區城鎮亦屬少見⁴⁵。以下，我們可以用圖五的“長

⁴⁰在九零年代之前，搬運人員欺行霸市，隨意要價，縣與鎮兩級政府即時召集有關部門，成立「搬運管理辦公室」對搬運隊進行整頓，統一定價、統一調度與統一收款(王士新 等，1992)。

⁴¹例如，具體的在市場調整收費標準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對市場內的各項收費，按原有收費標準下降25%；充分發揮市場各管理部門的職能作用，理順治安管理關係，成立「民警室」，組織「市場巡察大隊」等，為市場提供廉潔與簡化的經營環境；透過市管會辦理《市場簡報》蒐集情報，為木材經營者提供信息（無為縣人民政府辦公室，1997， 會議紀要 —內部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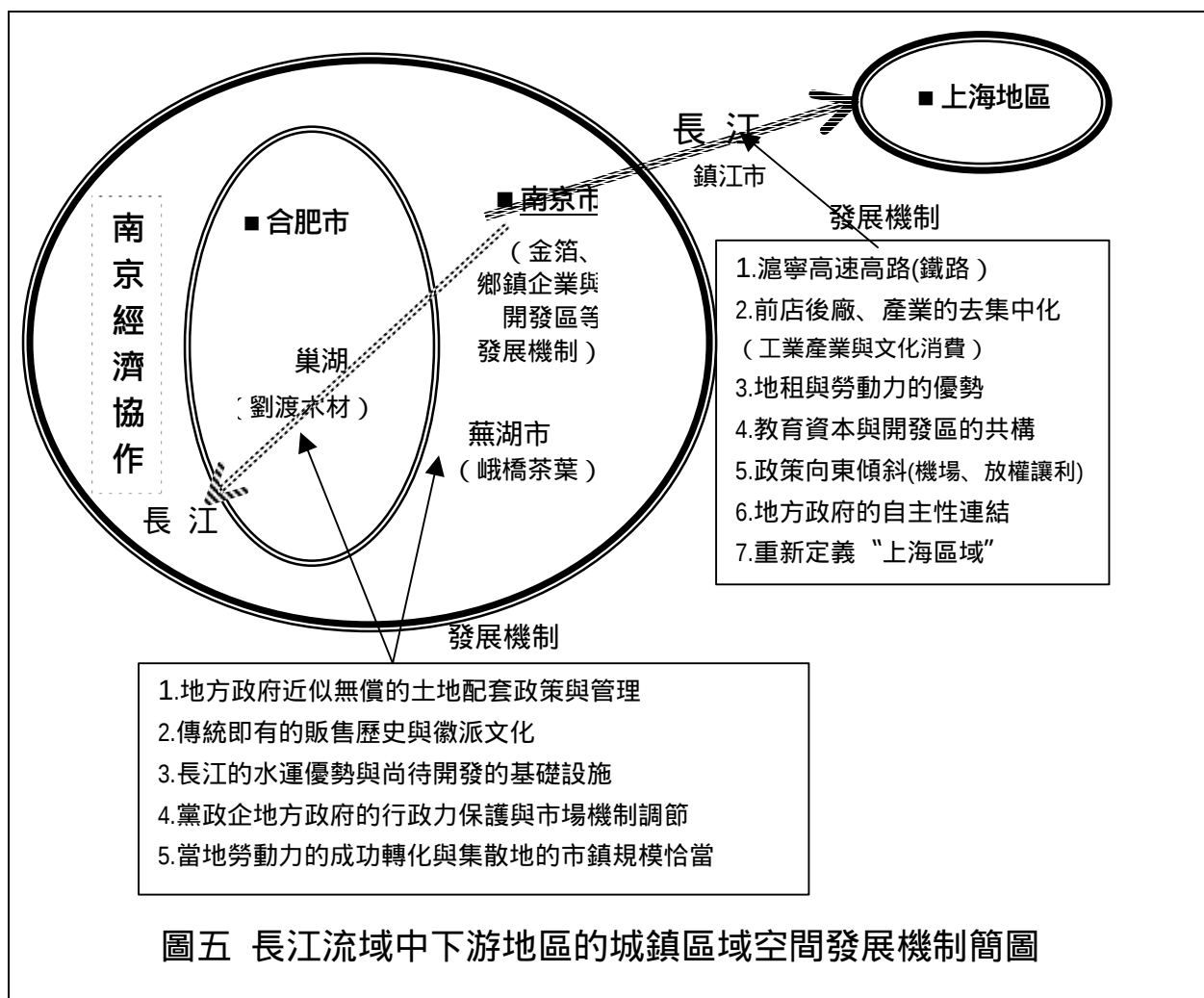
⁴²例如，律訂相關城建與交通部門，協助劉渡鎮政府做好規劃的分步實施工作，具體而言，即是木客商的營運住房，以及透過鎮政府、市管會、工商局、公安、交通與稅務等部門的配合，共同負責交易市場裡的餐飲、商業和金融等第三級產業的統一規劃；同時藉由法令規定滅螺堤外的第一貨場不得建房，從滅螺堤外到大堤新闢20公尺寬的公路（無為縣人民政府辦公室，1993， 會議紀要 —內部資料）。上述的設施與設備營造木材交易市場的便利性與可及性。

⁴³例如，1986年開始，工商、稅務與鎮政府三家聯合辦公，對成交木材進行一次性開票收取稅費，極大地方便客商交易(劉渡鎮鎮政府，1998: 7)。

⁴⁴劉渡鎮的主要產業經濟還有水泥廠與農業生產，但卻能以“非當地生產”的木材(交易)而聞名全中國大陸，這並非是常見的西方城市發展學理（例如，地租理論、重力模式、成長級理論等）所能解釋的。它是經濟改革開放後，九零年代中國大陸長江中下游城鎮由下自上，透過（不完全—肇因於地方政府的黨政企權力的可操控）自由市場經濟之產物(洪啟東，1998)。類似的案例，如安徽省李興鎮的中藥交易市場亦是。

⁴⁵透過中共（1997）國內貿易部文件（內部資料）對批發市場審核公告統計發現，與田野訪談過程中之受訪者所告知。

江中下游城鎮區域空間的發展模型” ，來圖示化本年度的研究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與整理。

四、計畫成果自評與結論：

本研究相當程度釐清了經濟改革開放後，《上海區域空間變遷機制（ ）》並非為“長江流域的城鎮發展典範”（王鴻楷，1997；洪啟東，1998），前述的研究成果表明地方政府提供有利於“在地產業市場化”的行政權，以及土地的管理權與審批權，這是有利於空間商品化的轉化機制，同時有得利於中央政府的“放權讓利”政策效應。但是，《上海區域空間變遷機制（ ）》則指出，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城鎮空間發展，幾乎是來自地方政府的積極自主性市場化與“經濟協作”的條塊策略聯盟，此等發展機制是不同於區域城市上海的發展模式。本研究一方面透過不同的案例研究，述明地方政府如何搭配地方鄉鎮企業、“合縱連橫”的成立「經濟協作區(辦公室)」，與地方自主性的由市集演化為“全國中心”，進而闡明九零年代長江中下游城鎮區域空間的旺盛空間發展意志，

另一方面也將有關的區域發展理論作出評介與修正。

研究成果應有助於今後政府兩岸城市發展交流與經貿投資政策的制訂，同時也應有助於瞭解彼岸地方政府的組織及行為模式。在區域空間結構方面，本研究比較弱的環節，在於因限於時間與兩岸政治的敏感，對於案例的鄉鎮企業之集團化的過程，並未深究；而且對於寧皖贛經濟協作區的三個中心城市的互動，也未能深入，甚為可惜。

但是，本研究就“上海區域”的界定則更為明確(這是前研究所未能釐清的)，亦即，上海與南京一直並無直接的經濟隸屬關係存在，南京的空間效應表現在皖南、鎮江與揚州地區，並未超過常州的東面，而且南京長期以來是政治與軍事的中心，與上海為經濟中心的性質是相當不同的。因為南京在經濟上的表現從來就是差強人意(這也是經濟協作區成立的動機之一)，而武漢與重慶就空間經濟的波及與歷史而言，皆勝於南京的“腹地”(受長江流域而限制了江北的發展，且遭受蘇南中小城鎮，例如，揚州、鎮江、常州、蘇州等的經濟競爭威脅)。其次，南京也因為是過去國民政府的首都，因此在意識型態上，空間的經濟發展就不受共產黨的青睞與重視；另一方面，安徽(皖北)與江西(贛南)都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老基地，自古以來就是窮與交通不便，經濟的發展相對弱勢；“解放”之後，本地區也未有投資、社會與自然資源也是貧瘠的。前述的空間未發展狀態到了九零年代之後，透過地區中心城市南京的積極搭台而有了轉機，同時中央政府也欲藉由京九鐵路⁴⁶的設立，作南北區域間的資源分配與交流。

這些在在的述明，長江中下游地方政府的積極活力與市場性的政策調節，也具體化了現今中國大陸中小城鎮與區域空間的發展機制與模式種類，且更有益於本土對於大陸地區區域與都市研究論述經驗與成果的積累。我們相信此等研究，對於今後兩岸的學術文化、經濟交流與政策制訂應有實質的助益和啟迪作用。

五、引用文獻

(一)、中文部分：

王士新、黃萬著、汪言海 (1992) 劉渡何以列入“共和國之最”：無為縣發揮政府功能培育市場的調查，〈《安徽日報》〉，11月24日。

⁴⁶又稱扶貧鐵路，鐵路沿線都是貧縣，例如，安徽(合肥)以前是沒鐵路的，是故透過京九鐵路的聯繫來發達地區間經濟。京九鐵路主要為南北方向的貨運交流，廣廣鐵路則為客運的功能（1998/11/10的訪談紀錄）。

- 王鴻楷 (1995)《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都市商業空間結構變遷之個案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1996)《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都市商業空間結構變遷之個案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1997)《都市空間發展與國家體制：台北與上海的比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1998)《經濟改革開放後上海區域的空間結構及其使用變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王鴻楷、洪啟東 (1999) 經濟改革開放後上海都市土地利用的轉化：中學與電表廠案例，〈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第九卷第一期，頁 113-131。
- 史忠良、李建德 (1996) 世界性都市的形成與長江流域的協調發展，姚錫堂編《長江流域經濟發展論》，頁 216-235。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仲玉琪 (1995) 南京與上海差距何在，〈城市研究〉，總51期，頁 31-35。
- 同濟大學城市規劃教研室 (1982)《中國城市建設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 安徽省劉渡木材市場管理委員會 編 (1998)《安徽省劉渡木材簡介》。安徽：無為縣劉渡鎮木材管理委員會。
- 吳浙 等 (1995)《傾斜的斜國土－中國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現實與趨勢》，頁 152-170。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 李廣錡、周嵐 (1995a) 當代南京城市規劃四十年(上)，〈城市研究〉，總50期，頁 7-11。
- (1995b) 當代南京城市規劃四十年(下)，〈城市研究〉，總51期，頁 50-54。
- 南京市計劃委員會、南京區域經濟協調會、中國科學南京分院 (1997)《南京經濟區域跨世紀發展和區域合作規劃》。南京：南京市計劃委員會。
- 南京沿江地帶的開發建設課題組 (1997) 南京沿江地帶的開發建設，〈城市研究〉，第五期，頁 51-57。
- 姚士謀、帥江平、李白華 (1998) 南京，姚士謀 編《中國大都市的空間擴展》。頁 381-402。合肥，安徽：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洪啟東 (1998)《轉化中的後社會主義城市區域：改革開放後上海區域的空間變遷》。博士論文。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洪啟東、王鴻楷 (1999) 從滬郊到南京的開發區現象探討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空間轉化機制，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 編《兩岸人口、城市與區域研究學術交流座

談會論文集》。頁 45-6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

洪銀興、曹勇 (1996) 第一章 江蘇與上海：競爭、依賴和一體化趨勢，陳德明、洪銀興與曹勇 主編《中國區域發展中的江蘇經濟》，頁 153-168。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郁謙 (1985) 對上海經濟區域鄉經濟聯合的探討，江蘇省社會科學經濟研究所編《上海經濟區研究論文集(第二集)》，頁 41-48。南京：江蘇省社會科學經濟研究所。

崔功豪 (1993) 南京城市發展、演變及其前景，楊汝萬 編《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展望廿一世紀》，頁 280-30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曹幸穗、楊彬、李琴芳與林剛 (1996) 十年建設時期的南京經濟，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編《南京經濟史》，頁 315-317。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

陳吉元 編 (1988)《鄉鎮企業模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黃明達 (1993)《城鎮體系的結構與演化：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博士論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所。

蓋星石 (1997) 以南京為中心的寧鎮揚蕪區域城市群體發展的構想，《城市研究》，第五期，頁 36-40。

趙晨 (1996) 城鎮空間的分佈與擴散：南京地區城鎮整體發展研究，《城市規劃匯刊》，第二期，頁 12-20。

劉渡鎮鎮政府 (1998)《雄鋸江灘廿載，吞吐華夏木材：共和國之最安徽省劉渡木材市場成功之路》。安徽：劉渡鎮鎮政府。

顧松年、嚴英龍、仁新保 (1985) 上海經濟區的前進有賴經濟技術協作網絡的縱深發展，江蘇省社會科學經濟研究所 編《上海經濟區研究論文集(第二集)》，頁 23-40。南京：江蘇省社會科學經濟研究所。

(二)、英文部分：

Andrusz, Gregory, Harloe, Michael and Szelenyi, Ivan (eds.) (1996) Cities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Budd, Leslie and Whimster, Sam (1992) Global Finance and Urban Living: A Study of Metropolitan Change. New York: Routledge.

Campbell, Scott and Fainstein, Susan S. (eds.) (1996) 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 Cannon, Terry and Jenkins, Alan (eds.) (1990) The Geography of Contemporary China : The Impact of Deng Xiaoping's Decade. New York: Routledge.
- Castells, Manuel and Henderson, Jeffrey (eds.) (1987)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London: Sage.
- French, Richard Anthony (1987) 'Changing Spatial Patterns in Soviet Cities: Planning or Pragmatism?', Urban Geography, 8(4): 309-320.
- French, Richard Anthony and Hamilton, F. E. Ian (eds.) (1979) The Socialist City : Spatial Structure and Urban Policy. 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 Gaubatz, Pirer Rae (1995)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Post-Mao China: Impact of the Reform Era on China's Urban Form', in Deborah S. Davis,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Pp. 28- 60.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Press.
- Gottmann, Jean (1961) Megalopolis: The Urbanization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 Grava, Sigurd (1993) 'The Urban Heritage of the Soviet Regime: The Case of Riga, Latvi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Winter: 9-31.
- Harvey, David (1985)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 Basil Blackwell.
- Jacobs, Bruce and Hong, Lijian (1994) "Shanghai and Lower Yangzi Valley", in David S. G. Goodman and Gerald Segal (eds.). 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Pp. 224-252. New York: Routledge.
- Powell, Simon and Leeming, Frank (1990) "Nanjing: Rural-Urban Relationships", in Terry Cannon and Alan Jenkins (eds.). Geography of Contemporary of China: The impact of Deng, Xiaoping's decade. Pp. 160-167. New York: Routledge.
- Putterman, Louis (1995) "The Role of Ownership and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44: 1047-1064.
- Shen, Daoqi and Yao, Shimou (1988) "Nanjing: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Victor F. S. Sit (ed.). Chinese Cities: The growth of the Metropolis since 1949. Pp. 128-14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Nigel (1998) Urban Planning Theory since 1945. Thousand Oaks, CA: Sage.